

書與人

在题无剩义处追索

村民的历史

回忆周一良师

父亲的书

在地铁看杂志

战争与肺炎



虚实之间

胡宝国/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虚实之间



胡宝国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实之间/胡宝国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

(书与人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967 - 1

I. ①虚… II. ①胡…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文集
IV. ①K220.7 - 53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2823 号

· 书与人丛书 ·
虚实之间

著 者 / 胡宝国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王洪强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5.25

字 数 / 125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967 - 1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这本小书收录的基本是我这些年在网上写的一些闲散文字。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史学有关，一类则与史学无关。如何给这小书起个名字呢？我真的有些犯愁了。还是老朋友罗志田兄有办法。他建议书名就叫“虚实之间”。看到他的建议，眼前一亮，感觉这的确是个合适的名字。史学是我的专业，与此相关的部分自然是属于“实”，而那些与此无关的呢？自然就是属于“虚”。

所谓“实”是相对于“虚”而言的。其实如果深究一下，这“实”也是有问题的。其中几篇学术评论性的短文，严格说来并不规范。所以有位老同学称我的这些文字为“另类的书评”。我估计他这么说还是有夸奖我的意思的。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既然肯当面告诉我，当不至于是骂我。这些书评之所以看着比较“另类”，我想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正规的书评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学术史脉络的交代，要把评论的对象置于这个脉络之中加以考察，而我则常常不是这样。第二，正规的书评通常会对评论对

象的整体进行一番介绍、评价，而我则常常只是就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借题发挥”。说是“书评”，其实很多场合我更关心的是写书的“人”。

“虚”的部分其实也是有实有虚，就是说，有的是写实的，有的则纯属虚构。如果不谦虚地说，这部分可能比较靠近“文学”。当然我很清楚，对于文学，我只是一个偶尔的业余爱好者。

说到这里，我又要借题发挥了。在网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业余历史爱好者发言。对他们的发言，我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看着他们在自己并不真懂的领域说三道四，的确比较烦。可是一转念，又会非常羡慕他们。专业工作其实是很枯燥的，愿意干的时候要干，不愿意干的时候也要干。它的要求是严格的，目的性也很强。而业余爱好就不同了，这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好。它没有功利性，也没有负担，如果不喜好了，随时可以放弃。

当我在网上写这些“虚”的文字时，我的心态就是一个十足的业余爱好者的心理。这些文字只是写着玩，只是图个愉快。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功名心、事业心都渐渐淡去的时候，愉快的生活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有职业，也要追求愉快，所以，今后大概仍然会在“虚”与“实”之间游走。

目录

自序	001
读《东晋门阀政治》	001
在题无剩义处追索	008
读唐长孺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	018
周一良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	025
通者的气象	033
读《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039
村民的历史	043
关于“汉唐间的史学”	048
《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	060
六朝地志	071
关于南朝化问题	080
读《方言》，说历史	089
读三种《观世音应验记》	093
怀念周一良师	104
父亲的书	109
话说长江学者	116
鉴定文章	119

在地铁里看杂志	121
一个无味的 P	125
关于 A 君，随便说说	128
清明时节忆双亲	131
火锅	134
喝酒	137
老王的一天	140
去大同开会	146
战争与肺炎	151
日本印象	154
马经理	158

读《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中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存在着。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些由

流民帅控制着的武装组织。起初，他们在热闹的政治史中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背后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

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无济于事。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本书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须要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作者在此是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为何会发生变化呢？这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作者又再次触及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叙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余庆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

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有困难的，因为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复杂的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曹魏政治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完整链

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晰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显，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这学说说穿了其实就是血统论。因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任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或许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从深层次上看，他有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宁可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

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深刻，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客观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意义的许多细节、许多点上也有极精致的、令人叹服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多。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研究者应特别注意克服自己的弱点。因为你的优势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弱点如果不被克服就会妨碍进步。这个认识看似合理，其实是有些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真正严重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本文写于2001年

在题无剩义处追索

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已于2003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24万字，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这部分展开。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朴说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魏书·官氏志》所谓‘七族’、‘十姓’，是拓跋部落联盟新形成的核心，血统亲近，‘百世不婚’。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24~25页）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

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将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